

东亚古代文化中的阴阳理论之嬗变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in the ancient East Asian culture

刘 萍

(中国, 北京大学)

《 Abstract 》

When people discuss the continent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ancient East Asian culture, people alway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wo major culture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ut offer little explanation to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ase of the two major cultures.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existing a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at a profounder level, possesse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that are always embedded into the mainstream of thought, religions and customs, displaying its unique glamour in its unique way. Its influence is more than that, however. It has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and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ulture of East Asia.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this field of study.

After the erudite scholar of The Five Classics made a voyage to the east in the early sixth century,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ancient classic expounding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started to circulate among the Japanese court, via Baiji in the Korea Peninsula. As a result,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found its way to Japan. Examining the spreading channels, we learn that the theory's dissemination was largely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Buddhist monks. Shoutoku Prince, regent of Japan at the time, was himself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Buddhism and was excelled i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In the Twelve Ranks System and Seventeen-article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by Shoutoku Pri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of 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can be visibly discerned. This obviously proves the sublime status of the Chines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in Japan, thanks to the victory of the political clique that adored Buddhism.

In the shaping course of ancient Japa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served a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ource of its development. Mythology based on *Kojiki* and *Nihon Shoki*, two earliest Japanese books that exist today, record

mythological stories about the emergence of the Japanese nation. The notion about the birth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forming of Japanese Shinto, expressed in the mythological stories, not only tell us the source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Japa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nation's world outlook in the transition from barbarian period to civilized period, as well as the basis for it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ll these were marked with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s on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s, was accepted as a political belief when it first spread to Japan. The emerg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both the Mikado system and the centralized regime in ancient Japan drew largely on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adopted it a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asis to deify and aggrandize the "imperial power" so as to prot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imperial ruling and consolidate the established regime. Following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ized state power,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was further employed, and gradually "hidden" in Japanese cultur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finally becoming the edge tool of ancient Japanese Mikados in exercising political power and controlling the country.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Shoutoku Prince, Mythology based on Kojiki and Nihon Shoki, Shintotoism,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阴阳理论、圣德太子、记纪神话、神道、天皇、阴阳道

在论及东亚古代文化中的大陆文化因素时，人们都非常重视中国儒、道两大文化的存在，从漫长的古代文化交流的总体势态来考察，事实也确乎如此。不仅儒家文化被看作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力量，道家文化也毫不逊色地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多侧面地体现着它的文化渗透力。在东亚古代文化的律动中，既可以看到对中国老庄“道家思想”的袭用，也可以看到对作为中国本土宗教而集民间信仰之大成的“道教文化”的吸收，其中亦不乏对《易》、对“阴阳讖纬”以及对“巫祝方术”的奉习。

在上述表像背后，作为更深层面的理论渊源而存在的，无疑便是早自上古时代就已为中国人所认知的阴阳哲学学说。尽管阴阳理论并未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独立派别而得以流传，但其哲学内涵却始终附着于主流思想之中，积淀于宗教民俗之中，以其特有的方式施展着它的独特魅力。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渐，阴阳理论对于东亚古代文化的重大影响，便体现在东亚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思想信

仰、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以古代日本为例，无论是就其王朝国家的建设，还是就其上古文化的孕育，乃至其“皇权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中国的阴阳理论都具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便旨在围绕这些相关问题，就中国的阴阳哲学理论在东亚古代文化中的发展与嬗变作一探究。

I . 阴阳理论与圣德太子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哲学范畴恐怕就是“阴”和“阳”这两大基本要素了。

所谓“阴”“阳”，原本是描述与太阳有关的方位的概念。《尚书·禹贡》有“自岷山之阳至衡山”、“南至华阴”等语句，其中的“阳”当是指面向太阳的岷山之南，而“阴”则是指背对太阳的华山之北。然而，远古时期的中国先民在不断地观察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阴、阳来解释万物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思维模式，在《诗经·大雅·公刘》中可以看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在《国语·周语·上》中又记有“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种以阴、阳二元观察自然、解释世界的基本认知理念，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人认识宇宙、认知自然而形成的一种世界观，它视世间万物皆由阴阳相生，阴阳相成。与这种理念同时出现的还有“五行说”，认为天地自然、四时人间乃至人事异动、历史变迁都是由阴阳二元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相转而成，此即后世的所谓阴阳哲学学说。阴阳理论至战国后期由齐国的邹衍总其成，他力倡阴阳五行之说，以阴阳说和五行说为中心构筑其哲学体系，又进一步提出“五德终始说”、“五德转移说”，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种势力的支配，以此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与王朝的更替。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主倡阴阳学说的“阴阳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被列入九流之中。

阴阳理论学说在战国以后并未形成独立的学派，但其发展却始终没有中断，并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它不断与其他各种思想学说诸如讖纬说、祥瑞说、灾异说等相融和，其主张又逐步被其他思想学派所吸收而获得发展。从战国末年到汉代，阴阳理论在广阔的思想领域产生着影响，其结果不仅使之成为后世儒、道两家的哲学依据，也构成了稍后形成的道教的神学基础。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阐释阴阳理论的最基本的著作可以说是《易经》。庄子在《杂篇·天下》中论及“六经”时就会说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物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¹⁾。此可谓一语中的。

1)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阴阳理论是藉由《易经》的东渐而得以传之扶桑。

1. 阴阳理论的东传

《易经》传入日本的最早年代是在六世纪初的继体朝（507-531）时期。相关记录可见于日本的早期文献《日本书纪》。据《日本书纪·继体天皇卷》记载：

七年（513）夏六月，百济 … 贡五经博士段杨尔。… 十年（516）秋九月，百济 … 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²⁾

五经中包含有《易经》，因此，五经博士的东渡，标志着在日本古代朝廷中，开始正式传习《易经》，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阴阳学说自六世纪初，已经以朝鲜半岛的百济为中介，开始传入了日本。

此后的钦明朝（539-571）时期，阴阳学说的传播更加活跃，不仅继续有五经博士的到访，还相继出现了易博士³⁾、历博士等。据《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卷》记载：

十四年（553）六月，遣内臣使于百济，… 别敕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 … 又卜书、历本、种种药物，可付送⁴⁾。… 十五年（554）二月，百济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⁵⁾马丁安。… 别奉敕，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 … 皆依请代之⁶⁾。

其后至推古朝，甚至开始以朝廷的名义命人奉习阴阳之学。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卷》记载：

十年（602）冬十月，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也。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学方术，皆学以成业⁷⁾。

2)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29页、第35页，岩波书店，1969。

3) 在五经博士之外另有易博士，与当时百济向中国求请易占卜书有关。事见《宋书·蛮夷传》：“文帝嘉元二十七年，百济王表求《易林》、《占式》、《腰弩》 … ”。《宋书》卷九十七，第2394页，中华书局，1983。

4)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105页，岩波书店，1969。

5) “固德”及下文“施德”，皆为百济官名，分列百济官位十六阶第九、第十。

6)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109页，岩波书店，1969。

这里提到的师从观勒的书生，他们当中大多都是来自大陆的移民的后代，如大友高聪就是出身于近江国滋贺郡大友乡的归化氏族的后代，据说后世的甲贺武士五十三家中的大友大伴一族，就是以发端于遁甲的甲贺忍术而著称的⁸⁾正是这些博士的频繁往来、交接，使得中国的阴阳学说在日本的影响不断深入。

从阴阳学说的流布途径来看，似乎与佛教僧侣的活动有着很大关联，这就决定了早期的阴阳学说在介入古代日本文化时，更多的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这与日本民族的早期宗教信仰有着很深的契合点。而日本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围绕佛教正在发生着严重的对峙和斗争，阴阳学说也就很快被裹挟其中，成为崇佛派反对排佛派的有利武器。随着崇佛派的胜利，中国的阴阳学说自然获得了被推崇的地位，并在此后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在新的政治体制权威的确立、新的政治理论的形成以及国史编纂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 圣德太子及其理想国建设

百济僧人观勒到达日本的推古朝（592-628）时代，刚刚经历了皇位的频繁更迭 - 推古天皇的前任崇峻天皇（587-592），在接替了在位仅两年的用明天皇（585-587）即位后，又在执政的第五年遭到暗杀 - 朝政实际上左右在物部氏和苏我氏两大对立集团手中。朝廷之外，又被强大的地方豪族所控制。因此当时作为推古帝摄政的圣德太子（574-622），急欲着手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体制。而当时的东亚，居于大陆版图上的威名赫赫的统一大帝国 - 隋王朝，在朝鲜半岛上则正处于朝鲜民族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在隋王朝的强大威势下，高句丽、百济、新罗相继与之交好。远在大和民族，经由朝鲜半岛的中介，不断地获知到这些信息，对于当时东亚外交上的这一基本态势，也无疑要做出回应。公元600年，在与大陆隔绝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推古朝派出了第一次“遣隋使”，并很快与隋朝建立了国交。与大陆的交好，使圣德太子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国家的梦想终得实现。

圣德太子是一位佛教的积极拥护者，同时他也精通《易》学与阴阳理论。作为政治家的圣德太子，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打破豪族统治，授以有能力者官位，从而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官僚体系，这就是著名的“十二阶冠位制”。在《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卷》中，对此做了详细地记述：

7)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 第179页，岩波书店，1969。

8) 泷川次郎，《二条阵屋研究》，《早大比较法研究所纪要21号》，1962。

十一年（603）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并十二阶，并以当色繩縫之，顶撮总如囊而着缘焉。唯元日着髻花⁹⁾。

这里所说的“十二阶冠位”是以“官帽”的不同种类来表示官僚的等级以及他们在朝的座次，其中明显融入了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如“十二阶冠位”的顺序便不是按照儒教的“德、仁、义、礼、智、信”之序，而是依据《管子》的五行之说，排列为“德、仁、礼、信、义、智”¹⁰⁾。在确认各阶位的“冠色”时也与阴阳五行之说相符，其中“德”为最高阶位，配以紫色。“德”以下，与木相配的“仁”为青色，与火相配的“礼”为赤色，与土相配的“信”为黄色，与金相配的“义”为白色，与水相配的“智”为黑色，再以颜色的深浅区别“大”、“小”，以此构成十二阶。另据考证，十二阶的十二之数也与阴阳学说的所谓太一星有关，即天帝所居的太一星，有十二个卫星围绕，以此象征新的政治体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

“十二阶冠位”制中所渗透的阴阳思想还表明，日本在建构古代集权国家体系时，特别注意顺应阴阳五行之说，以避“妖变”，更兼招祥纳福。这里所说的“妖变”指的是种种怪异现象所暗示的凶兆，有“服妖”、“诗妖”、“草妖”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服妖”指的是由服装所表现出的凶兆，即某种特定的色彩、图案或奇异服饰的流行会招致祸患，含有不吉之兆，如深红色服装的流行会导致火灾的频繁发生。此说在注重审美的平安朝宫廷中，尤其为人深信不疑。“诗妖”是指在民间流行的童谣、歌谣中，用含有不吉意义的言辞暗喻君主之背德。“草妖”则是指自然界中某些植物特异的变化隐喻着人间的凶象，如一基二萼的莲花、雪上的灵芝等等。这些都与阴阳学说中的天人感应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无疑说明了阴阳学说与人类内心潜藏的趋吉避凶的生存本能有着深深的契合，而其在日本的流布更是与日本本土的原始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有效地确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强化“十二阶冠位”制，在其

后的第二年，即推古朝十二年的四月，圣德太子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并非今日所称之法律，而是当时为各级官员制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内容上则吸收了儒、道、佛各家学说，而尤以阴阳学说为其最基本的要素。无论从其颁布年代的选择上，还是十七条文之数的确定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缘于阴阳学说的痕迹。

“十七条宪法”颁布的推古朝十二年，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法，是“岁在甲子”。在中国的阴阳学说理论中，有所谓的“甲子革命”的讖纬之说，即以殷亡周兴前后

9)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180页，岩波书店，1969。

10) 冈田正之，《宪法十七条に就いて》，《东洋文库论丛第十·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第61页，东洋文库，1929。

的“甲子”和“辛酉”为基准，逢“甲子”、“辛酉”之年，必有革命之事兴起。圣德太子选择这样一个甲子之年颁发号令，无疑是希望以此预示新政由此而始。关于条文的十七之数与阴阳学说的因缘关系，日本学者依据中国的《管子》和《春秋纬书》推断，认为是将阴的极数八和阳的极数九相合而成的¹¹⁾，这一结论今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这种利用阴阳讖纬之说确定年代的方法，在国史编纂过程中运用得可谓登峰造极。推古朝二十八年（620），圣德太子与苏我虾夷等人合作编纂了日本最早的正史《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翌年太子亡。皇极天皇四年（645），苏我氏灭亡时，在家中将此书烧毁，所幸其中的《国记》部分被船史惠尺抢出而得以流传。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成书于奈良时代（708-781）初期的《日本书纪》，就是在《国记》基础上、继承圣德太子编纂史书的方针而完成的。在年代的确定上，毫无二致地利用了阴阳讖纬之说。前述圣德太子在颁布“十七条宪法”时，选定了甲子之年的推古朝十二年，而在推定日本的开国纪年时，又以“辛酉”之年的推古朝九年为基准，由此上溯1260年，定为神武天皇元年，即日本建国之始。从这一近乎荒诞的历史表象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思想，阴阳理论的影响力、渗透力是至深且矩的。

II. 阴阳理论对日本上古文化的渗透

在日本现存最早的两部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着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即所谓“记纪神话”，其中不仅展现了日本民族起源的历史进程，也显露了处于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中的日本民族的世界观及其哲学思索的基盘，其中明显地保留着中国阴阳理论的深刻印记。

1. 日本“记纪神话”中的“宇宙生成论”

《古事记》是一部完成于八世纪初的“和文”文献，但在其序文部分关于天地生成、万物起源的描述，却完全采用的是汉文方式：

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三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¹²⁾

11) 冈田正之，《宪法十七条に就いて》，《东洋文库论丛第十·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第66页，东洋文库，1929。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古事记》的开篇完全是以建立在阴阳理论基础上的中国道家的宇宙观、哲学观为范本写就的。其中首先出现的“混元”一词，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道家思想的鼻祖《老子》第二十五章中，对宇宙的生成是这样表述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¹³⁾

这里的“道”即是老子道家思想核心的“道”，它超越于天、地、人之上，先天地万物而生，是主宰宇宙的自然混成之法。这一构成万物之根源、宇宙之理法的所谓“混成之物”，可以说就是“混元”一词的最早出处。在《周易》中，开始明确地使用“混元”来描述宇宙的形成：

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¹⁴⁾

在五世纪以后出现的与道教有关的论说中，继续承继了道家的这种以“混元”论天地的宇宙观。如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陶弘景（456-536）在其道教理论著作《真诰》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

混元记混沌前之事。… 道，混然生此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为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¹⁵⁾

在《古事记》序文中，继“混元”之后，还出现了诸如“无名”、“无为”、“阴阳”等名词概念及其叙事意象，查其出处，皆源自中国早期的道家著作。如《老子》第一章中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第二章中所说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三十七章中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

12) 《古事记·祝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第42页，岩波书店，1969。

13)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14)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15)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八章中所说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第四十二章中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庄子·天地篇》中所说的“无为而万物化”；《天运篇》中所说的“一清一浊，阴阳调和”；《秋水篇》中所说的“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知北游篇》中所说的“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等等，都是有碍天地自然、人间万物的阐述¹⁶⁾。毫无疑问，《古事记》所阐述的创世思想与中国的阴阳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以汉文撰写的《日本书纪》中，也表露了同样的宇宙观，而且描述得更为详尽：

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转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于时天地之中生一物，状如苇牙，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¹⁷⁾

这里同样是以“阴阳剖分”的观念，阐述了宇宙的起源与神祇的形成，从这段文字看，则无疑是直接从《淮南子·天文训》的如下文字中推演而成的：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漉漉，故曰太昭。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¹⁸⁾

按照中国古代图书目录的分类，《淮南子》历来是被列入杂家之类的。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将其视为道家文献的。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早探究世界本源这一哲学命题的，无疑是老庄的道家之学。而《淮南子》在对世界的形成、天地的开辟等问题的阐述上，则无疑是继承了道家的学说观念。

“记纪神话”所表述的关于天地形成、万物化生的观念，固然表达的是日本民族早期的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但事实上它是综合了中国道家文化体系的哲学观而形成的¹⁹⁾。可以这样说，“记纪神话”中所表达的关于“宇宙生成”的观念，明显地受到了中国道家文化的影响，其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阴阳理论的痕迹。

16)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17) 《日本书纪·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第77页，岩波书店，1969。

18)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19) 严绍璁，《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神道”与“祓禊”

说到“神道”，人们往往认为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产物，然而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道”的观念，存在于早期的原始民族宗教信仰当中，与中国先民的“鬼神”观念、本土的风俗咒术相伴而生。

“神道”一称最早见于《易经·观卦》的“彖传”：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²⁰⁾

“天之神道”的“神道”，乃指自然之理法。从哲学范畴上说，所谓“神道”，便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世界观。至东汉时期，随着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神道”一词与咒术、道术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宗教意味也愈益强烈。在早期的道教著作《太平经》（即《太平清领书》）中，可以看到“神道”一词的频繁使用，诸如“神道”、“神道之书”、“清明之神道”等等。

在东汉以后的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以“神道”来指称道教的记载。如《后汉书》所云“惟神之常道”，是用“神道”一词来指称方术、仙术的；《晋书》中也有“虚柔而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的表述。经过二、三世纪的张角、张鲁，五世纪的寇谦之、陆修静，六世纪的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在佛教传入之后，中国本土的道教开始以“神道信仰”，与西来的“佛道之教”相抗衡。“神道”用语本身开始专属于道教——“惟神”虽然是用于指称神的，但是在这里显然已经专指道教之“神”了，而道教也成为“神道之教”的专名。²¹⁾

“神道”所包含的超现实的、宗教性的特质，使它与“天皇”、“真人”等称谓一样，成为道教哲学中富有重要含义的范畴，同时也成为日本古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作为日本神道学基本文献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在建构日本上古神话传说的过程中，就受到中国古代道教神道观的极大的影响。在日本，最早使用“神道”这一称谓的是成书于八世纪初的《日本书纪》²²⁾，分别见于“用明天皇即位前纪”、“孝德天皇即位前纪”和“大化三年四月诏书注记”等记载。据称“用明天皇信佛法尊神道”²³⁾，而“孝德天皇尊佛法轻神道”²⁴⁾。虽然两条记载反映的是日本古代天皇对“神道”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但“神道”一词在八世纪的运用是确定

20)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21)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严绍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2) 《道教と日本文化》，福永光司，人文书院，1982。

23)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155页，岩波书店，1969。

24)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269页，岩波书店，1969。

无疑的了。同时，见于中国道教理论文献《太平经》中的“清明之道”的阐述也同样受到日本神道学家的重视。所谓“清明之道”乃是道教构筑的清明祥和的天上世界 - 在那里，人间的喧嚣、纷争、战乱、悲苦都得到了超越。中国道家文化的这一理想，在日本神道的主张中也得到显现。日本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就曾明确宣称，日本神道的精神就在于追求“清明之心”²⁵⁾。江户末期的神道家平田笃胤也对中国的道教作过非常细致的研究，写下了《三神山余考》、《赤县大古传》、《仙境异闻》等著述。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的关联。

与道教对日本的影响有关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祓”的施行²⁶⁾。“大祓”是日本神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神事，但追溯起来，也可以从中国的上古民俗文化中找到源头。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周礼》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风俗：“女巫掌岁时祓除鬻浴。”²⁷⁾ 说的是用香熏草药沐浴以“祓除”凶邪。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祓除”时说：“祓除，乃除恶之节。”事实上，在中国自古就有“祓”、“禊”这种民间风俗。至魏晋时代确定下来于每年的三月三行“春”、七月十四行“秋”。《后汉书》称：“自行契濯，此之谓契祠。”在日本，各地神社于每年六月和十二月的晦日要举行“大祓”。所谓“大祓”，是在天武朝（672-686）时就已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的一种国家祭典仪式。在完成于大宝元年（701）并于翌年开始实施的《大宝令》的“神祇令”中，详细记载了关于“大祓”祭神的具体程序：

凡六月十二日晦日大祓者，中臣上御祓麻。东西文部，上祓刀，读祓词讫。²⁸⁾

与此相关的记载还有：

今东西文氏献祓大刀。²⁹⁾ … 大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东西文部解除如常。³⁰⁾

在这些文字记载中，都出现了“大祓”中的重要人物 - 东西文部。据日本学者上田正昭的分析，这里的“东”读作YAMATO，也写作“山东”，指奈良；“西”应读作KAWATI，也写作“山西”，指大阪。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古代宫

25) 《玉胜间》，《本居宣长》（日本思想大系40），岩波书店，1978。

26) 《道教と日本文化》，福永光司，人文书院，1982。

27)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28) 窪美昌保，《大宝令新解》第169页，南陽堂书店，1925。

29) 《古语拾遗》第202页，现代思潮社，1976。

30) 《续日本纪》卷二“大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条”：“大祓を廢す。ただし、東西文部の解除は常のごとし”。《续日本纪》第35页，现代思潮社，1985。

廷举行大祓时，是由奈良县、大阪府两地的文氏献刀、颂祓词。³¹⁾

那么，这个所谓的“东西文部”究竟是何许人也？按照《令集解》的说法为“东汉文直、西汉文首”。从应神朝（273-314）开始，中国汉人的后裔阿地使主率众东渡日本，其后代居住在皇城东边的YAMATO，又有来自百济的王仁的后代居住在皇城西边的KAWATI，东称“汉文直”，西称“汉文首”。很明显他们是来自大陆的汉人或朝鲜半岛百济的移民后裔。

直至七世纪末期，日本古代朝廷中人还不能自由地读写汉字，他们还不能把后来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事情，用文章化、文字化的方式加以传播。当时的日本天皇政权中，可以使用汉字来书写的人，大部分是来自百济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对于道教的思想、道教的知识有着很深的教养，日本古代宫廷举行的国家祭典仪式的具体实施，只有这些外来移民或其后裔才能胜任。因此，八世纪初的东西文部，是在接受并继承了百济风格的道教传统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日本古代朝廷的宫廷祭礼的。

那么，东西文部朗诵的“祓词”的形式又是怎样的呢？在成书于十世纪前期平安时代的《延喜式》中，记载了许多上奏给神祇的祝词，这些祝词中保留有东西文部的“符咒”。通过《延喜式》中东西文部的“符咒”，可以了解“大祓”时东西文部所吟颂的“祓词”的内容。

《延喜式》卷八“咒词”曰：

东文忌寸部献横刀时咒。

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以银人，请除祸灾；捧以金刀，请延帝祚。咒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³²⁾

这里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内容上看，“祓词”讲述的无非是祓除灾厄，祈祷天皇的安康、皇位的永祚。但值得注意的是，《延喜式》中的“祝词”都是以万叶假名书写的“和文体”文本，而唯有东西文部的“符咒”是以汉文写成的文言体文本，并且是以“汉音”朗读的。而且这些汉文体的文言又都是与道教有关的言词，诸如“昊天上帝”、“三极大君”、“东王公”、“西王母”等等，道教的色彩非常强烈。充分显示了日本神道与中国道教的渊源。

其次，原本在日本古代朝廷的各种国家祭祀典礼中，都是由朝廷官员或天皇近

31) 上田正昭，《日本古代の信仰をめぐって——古代信仰における道教思想の影響》，收入《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1号，大和书房，1977。

32) 《延喜式》第170页，吉川弘文馆，1977。

臣来致祝词的，《延喜式》对此有明文规定。在“祝词式”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凡祭祀祝词者，御殿、御门等祭，斋部氏祝词。以外诸祭，中臣氏祝词。³³⁾

这里的“斋部氏”是天皇身边值宿的近臣，属“八色之姓”中的“宿弥”，“中臣氏”是王朝宫廷的官僚，属“八色之姓”中的“朝臣”。惟独“大祓”是由外来的“忌寸”来承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日本神道与中国大陆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了。明治以后，神道跃身为日本国家神道，越来越强烈地被视为“纯粹日本精神的象征”，道教的内涵从神道的世界中渐渐脱落出来。然而尽管如此，在原神道的世界中，与中国道教哲学的内在渊源却是无法割断的。本居宣长也不得不承认老子之说“与真正的道（指日本神道）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的”³⁴⁾。

Ⅲ. 阴阳理论与“皇权意识”的强化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之一的阴阳理论，在东传日本的过程中，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政治信仰而被接纳的。随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产生和确立，阴阳理论更进一步成为神化及强化“皇权意识”的重要思想材料，最终成为日本古代天皇掌握政治权柄、控制国家权利的利器。

1. “天皇”观念的确立

日本皇权意识中居于首位的便是“天皇”这一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就在于要显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依据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们的见解，自古以来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其血统来自“天神”。2600年前由太阳神的后裔与海洋神的后裔生养了“神倭伊波礼毗古”，成为日本第一代天皇——此即“神武天皇”。自此以后，则其谱系万世一系，称号亘古不变。

“天皇”称号的最早出现，可以上溯到六世纪末、七世纪初之际。作为文物的佐证，一是被认为作于推古四年（596）的元兴寺塔露盘铭文中，使用了“天皇”称号——“大和国天皇斯归斯麻吕治天下钦明是以天皇并大臣”；一是刻于推古十三年（605）的元兴寺释迦牟尼光背铭文——“天皇名广庭，在斯麻斯吕时”；还有一个也是最被人熟知的完成于推古十五年（607）的法隆寺铭文——“池边大宫治天下

33) 《延喜式》第159页，吉川弘文馆，1977。

34) 《玉胜间》卷七，《本居宣长》（日本思想大系40），岩波书店，1978。

天皇”³⁵⁾。关于在外交上使用“天皇”一称的文献记载，则最早见于《日本书纪》。在《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纪》中有如下记载：

十六年（608年）九月，复以小野妹子臣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 皇帝”。³⁶⁾

这恐怕是日本历史上最早使用“天皇”一称的记录了。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确知的是，至少在七世纪初，日本的政治体制中既已出现“天皇”这一概念了。因此，我们看到在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中，即从开篇便相沿使用“天皇”这一称谓来指代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了。

“天皇”一称的定名，与这一时期日本致力于建设古代国家的追求不无关系。七世纪的东亚，无论是在日本列岛内部，还是日本以外的亚洲周边国家，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迁。从圣德太子的新政的实施到大化革新后律令国家的确立，日本已经顺利完成了古代国家的建构。这一方面是大和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必然，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历史性回应。这一时期，大和朝廷开始尝试改变以往与大陆中国的宗主国关系而与隋唐帝国建立了“国交”－围绕“国交”所发生的著名的“国交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民族诉求。

七世纪初亚洲大陆的中国，隋王朝又一次一统天下，雄霸一方。国威延及海外，声名达于东瀛。此时的日本正值推古朝时代，为王朝自身计，也急欲寻求与大陆文化的接触。于是连续四次派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先进国的文明”，同时欲与中国建交。第一次“遣隋使”赴隋是在推古朝八年（600年），但日本史籍中未有记载，只见于中国文献《隋书·东夷列传》³⁷⁾。第二次派出“遣隋使”是在事隔七年之后。

据《日本书纪》记载：

推古朝十五年（607年），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³⁸⁾

《隋书·东夷列传》也有相关记载：

35) 《道教と日本文化》，福永光司，人文书院，1982。

36)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193页，岩波书店，1969。

37) 《隋书·东夷列传·倭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谒阙。”《隋书》卷八十一，第1826页，中华书局，1973。

38)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189页，岩波书店，1969。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³⁹⁾

小野妹子在此次携带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字句，《日本书纪》中未见此句记载，只是说小野妹子归国时，自称隋朝回复的国书被百济劫掠而遗失，故而引起百官弹劾。推古天皇念其劳苦，下诏免究其责。按照《隋书》的记载，这封“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引起了隋文帝不快，被斥责为“无礼”。在翌年（609年）九月，当小野妹子率第三次遣隋使来中国时，在其上呈的《国书》中，已改写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了。可见《隋书》的记述，还是言之有故的。对于隋炀帝所指斥的“无礼”，中日两国学者都作过不少推论⁴⁰⁾，但依笔者之见，大和朝廷自称“日出之国”，而将大隋帝国谓为“日没之国”，这种比喻恐怕也是引起隋炀帝“不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推古朝廷在后来递交的《国书》中，才颇费斟酌地以单纯的东、西之分替代了“日出处”、“日没处”的称谓，以免令隋朝不快；然同时又以“天皇”与“皇帝”相对而称，来保持国格上的尊严。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古代国家，其大和民族的主体意识已渐觉醒。在《大宝令》中明确记载着，自八世纪初，大和朝廷开始以“日本”自称，在对唐、新罗宣布一等大事时一律采用“明神御宇日本天皇”的称谓，宣布次等大事时采用“明神御宇天皇”的称谓，对内宣布朝廷大事时则使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的称谓。这标志着自飞鸟奈良时代始，日本人已经正式以“天皇”一称来指称自己的最高君主了。

日本古代君主的称谓被正式确定为“天皇”，然而“天皇”一词却并非日语中所固有的词汇，很明显它是源于汉语的一种称谓。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可以找到“天皇”一称的源头。

《史记》卷四《周本纪》：

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⁴¹⁾

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天上帝”，表达的是华夏民族早期的一种神道观

39) 《隋书·东夷列传·倭国》，《隋书》卷八十一，第1827页，中华书局，1973。

40) 《天皇と中国皇帝》，沈才彬，六兴出版，1990。

41)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念。诚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史记索引》按：泰皇，太昊也。又《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也说“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遂类于上帝。”汉人郑玄注云：“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孔颖达在为《礼记·曲礼》中“太上贵德”所作的“疏”中也说：“太上谓三皇五帝之世也 … 三皇称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诗纬·含神雾》宋均注云“北极天皇大帝，其精生人 …”⁴²⁾这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神道形象，它以拥有对诸神的“绝对统治权”，而与人间大地上的统一王权相互呼应。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的道家文化理念中，寻找到了确定其最高君主名分与权威的恰当的称谓 - 一个既具有政治上的帝王的意义，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宗教上的含义，因而特别适于用来指称日本自古以来的“大王”的称谓 - 这就是“天皇”。⁴³⁾

视天皇为“现人神”、“现神”，这正是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化天皇的存在，强调对天皇的信仰，目的就在于要确立天皇的权威，从而确立日本古代国家的权威。在日本古代天皇中，天武天皇（673-686）对中国的道家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他曾“亲乘式占”、兴建“占星台”、建立“阴阳寮”，从而完成了对日本“阴阳道”的创建。或许正因如此，他也就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早被当作神祇来歌咏的一位帝王。

《万叶集》中有歌曰：

4260 大王は神にしませば赤駒のはらばふ田井を都となしつ
4261 大王は神にしませば水鳥のすだく水沼を都となしつ⁴⁴⁾

这是著名的“大王は神にしませば”（意即“因为大王是神…”）的和歌中的两首，作于持统朝时代（687-698）。歌中的“神”指的当然是如同高居于天穹的星宿一样的超现实的存在，而歌中颂扬的“大王”指的都是建都于飞鸟净御原宫的天武天皇。“因为大王是神，才会如此神奇地以田为都”；“因为大王是神，水鸟也要前来汇聚”。把“大王”即“天武天皇”看作是如同神一样的存在，这虽然是一种文学上的绮丽的想象，但也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视天皇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历史事实。

2. 阴阳祥瑞说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建元、改元

42)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刊，1988。

43) 《天皇考》，《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64。

44) 《万葉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第375页，岩波书店，1969。

大和民族迎来自己民族文化的黎明期，始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645-649）时期。“大化改新”以后，日本才有了“日本”这一国名。“大化改新”建立了日本的古代律令国家，这意味着日本开始进入了仿效中国唐代文化，施行律令制度的新时代。换言之，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基于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新的国家体制，而中国的阴阳学说理论则一直不断地被运用于建立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努力之中。在“大化改新”中，从新的行政组织的建立到土地税制的发足，直至帝都的建设，无一不蕴涵着深厚的阴阳思想理念⁴⁵⁾。特别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建立，又进一步引进了阴阳祥瑞之说，借以确立律令制政权的权威，维护其统治的稳固。这一点在日本古代国家的建元、改元上表现得最为彰显。

日本的律令国家年号的使用原本起源于中国。所谓“建元”即指君主即位的第一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在日本，年号的使用则最早始于大化革新之际。据《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卷》孝德天皇元年条记载：

“天丰财重日足姬（皇极）天皇四年（645）六月乙卯，（孝德）天皇、皇祖母尊、皇太子于大槻树之下，召集群臣，盟曰：改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四年为大化元年。”⁴⁶⁾

皇极天皇于即位后的第五天宣布建立“大化”年号，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开始使用年号的所谓“大化建元”⁴⁷⁾。

当新一代的君主即位时，则需改旧号建立新元年，这种改朝换代时的年号的更改，谓之“改元”。中国自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建元以后，选择佳名作为年号的制度便确定并流传下来了。随着中国古代阴阳学说的东传，日本古代国家在政权建立上也袭用了这一作法。日本历史上最早的以祥瑞而改元，就是发生在大化建元后不久的著名的“白雉（650-654）改元”。相关事宜在《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卷》中记录得颇为详尽：

白雉元年（孝德天皇六年、650年）二月庚午朔戊寅，穴户国司草壁连丑经献白雉曰：“国家造首之同族赞，正月九日于麻山获焉。”…

（二月）甲申，朝廷队仗，如元会议。左右大臣白官人等为四列于紫门外。以粟田臣饭虫等四人，使执雉舆，…而进殿前。…天皇即召皇太子，共执而观。皇太子退而再拜，使巨势大臣奉贺曰：“公卿百官人等奉贺，陛下以清平之德，治天下之故，爰有白雉，自西方出。乃是，陛下及至千秋万岁，净治四方大八

45) 村山修一，《日本阴阳道史总说》，塙书房，1981。

46)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271页，岩波书店，1969。

47) 日本最早的年号为“大化”，此为日本史学界通说。另有学者持有异议，认为《日本书纪》的记载或有疑。详情请参见村山修一《日本阴阳道史话》，大阪书籍，1987。

島，公卿百官諸百姓等，冀罄忠誠勤將事”。奉賀訖再拜。詔曰：“聖王出世，治天下時，天則應之，示其祥瑞。…穴戶國中，有此嘉瑞，所以，大赦天下，改元白雉”。… 48)

這是發生在孝德天皇六年（650）的一段歷史記載。當時，穴戶國（即後世的長門國）國司向朝廷獻上了一隻獵獲於本國麻山的白雉，朝廷遂召集有識者議論處置之道。眾人皆言此為瑞兆，於是，將白雉載於車輿之中，奉於朝廷之上，供天皇、皇太子及群臣共覽。遂有天皇頒詔，改元白雉，並為獻雉的穴戶國國司加封進祿，為穴戶國減免三年租稅。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眾人關於“瑞兆”的進言，皆與中國歷代的陰陽祥瑞之說有矣。其中，百濟王子豐璋引《後漢書》記載作答，曰：“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白雉在所見焉。”⁴⁹⁾曾留學高麗的道登法師，援引昔日高麗建伽藍遇白鹿、白雀及赴大唐使者携來三足鳥之事，稱：“斯等雖微，尚謂祥物，況復白雉”。僧旻⁵⁰⁾則歷數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所謂“白雉”瑞兆，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白雉曰，‘吾聞國之黃耆曰，久矣無別風淫雨，江海不波溢，三年於茲矣。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故重三譯而至。’又晉武帝咸寧元年，見松滋。是即修祥，可赦天下。”其所言之事皆可徵之中國古代文獻。⁵¹⁾

另一個以祥瑞而改元的典型實例是天武朝（672-686）末年的“朱鳥改元”。天武天皇在日本歷代天皇中，是一位以潛心陰陽之說而著稱的天皇。《日本書紀》稱他“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壯雄拔神武，能天文遁甲”⁵²⁾。天武天皇以武力推翻了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王子的近江朝廷，建立起自己的專制政權。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壬申之亂”（672）。在“壬申之亂”中，天武天皇借行陰陽占卜之術為其獲

48) 《日本書紀·下》(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 第313-317頁，岩波書店，1969。

49) 《日本書紀·下》(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 第313頁，岩波書店，1969。事見《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永平十一年，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後漢書》卷二，第114頁，中華書局，1982。

50) 推古朝時期學問僧新漢人旻，推古天皇十六年，曾隨小野妹子遣隋，歸國後在朝廷講解《周易》。大化革新時被封為“國博士”。

51) 《藝文類聚·祥瑞部》“雉”條：“孝經授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 … 春秋干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藝文類聚》第1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另：《藝文類聚·水部》“海水”條：“韓詩外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吾受命，國之黃發曰，久矣，天之不訊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藝文類聚》第17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又，《宋書·符瑞志下》：“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丁巳，白雉見安豐松滋。”《宋書》卷二十九，第863頁，中華書局，1983年。

52) 《日本書紀·下》(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 第383頁，岩波書店，1969。

胜呐喊助威。在《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卷》中有如下记载：

将及横河、有黑云。广十余丈经天。时天皇异之。则举烛亲秉式占曰、天下两分之祥也。然朕遂得天下矣。⁵³⁾

这里所说的“亲秉式占”，指的是当时流行的四种占卜方式——龟占、筮占、式占、算占之一的“式占”。“式”即指进行“式占”时使用的工具“式盘”。据《左经记》记载，源经赖曾在关白赖通官邸见过“式盘”这种占卜工具⁵⁴⁾，但这种占卜方法自十世纪后逐渐销声匿迹，实物也未见在日本流传。1925年，在朝鲜平壤近郊发掘了汉代的乐浪郡治遗址，在其中的石岩里201号坟的椁室及王肝墓北室分别发现了阴阳两枚“式盘”，东京大学博士原田淑女据此做出了式盘复原图，后泷川政次郎博士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说明⁵⁵⁾。

天武天皇借行占卜而预言胜利，这在战乱之初，无疑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树立信心。不仅如此，天武天皇对祥瑞之说也同样深信不疑。在“壬申之乱”中，天武天皇以与项羽长年苦战的刘邦自比，因相传汉为火德之国，故亦将己方旗帜尽数以为红色，以之作为祥瑞之色。在其即位后，最终于天武朝末年，改年号为“朱鸟”（686年），以示推崇火德。

直至平安朝（782-1181）初期，以祥瑞之故而建元、改元之事屡有所见。成书与十世纪初的《延喜式》是记录日本古代朝廷仪式行事的一部法典，其中，依据中国的阴阳学说，把确定祥瑞现象的基准分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四个等级，大瑞为庆云、麟、凤、神龟等五十八种，上瑞为白狼、赤兔、白狐、赤雀等三十八种，中瑞为白鸟、白雉、赤豹等三十三种，下瑞为嘉禾、芝草等十五种⁵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古代国家在其形成过程中，广泛吸纳大陆文化因素的基本历史事实。

3. 阴阳寮与日本阴阳道的形成

“大化改新”使日本古代国家开始进入基于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新的国家体制，即所谓律令制时代。这意味着日本尝试继承唐代文化，施行律令制度。大化改新以后形成的律令、记纪、万叶集、风土记等文献，为复原大化革新以前的日本，使后人了解当时的日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日本的民族自觉

53)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 第389页, 岩波书店, 1969。

54) 村山修一,《日本阴阳师史总说》, 塙书房, 1981。

55) 泷川政次郎,《遁甲と式盘》(收入《日本历史考古学论丛》)

56) 《延喜式》卷第二十一, 第527—528页, 吉川弘文馆, 1977。

正是始于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古代国家中央集权政治的不断强化和扩充，中国的阴阳理论被进一步加以应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隐身”于日本文化之中。

由律令制国家掌控的官僚机构“阴阳寮”的出现，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大化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早年即十分热中于阴阳学说，在即位为天智天后，不论在官吏职位的授予，还是在政权机构的设置等方面，都继续表现出了他对阴阳学说的青睐。

在《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卷》中有这样的记载：

十年春正月，以大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绍明。以小锦下授鬼室集斯。以大山下，授达率谷那晋首 …。以小山上，授达率顶上、吉大尚、许率母、角福牟。以小山下，授余达率等五十余人。⁵⁷⁾

这里的大锦、小锦、大山、小山皆为官名。继圣德太子首创“十二阶冠位制”以后，经“大化革新”对日本古代官制进行了一些改造，至天智天皇三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职官建制，依次设立了“织”、“缝”、“紫”、“锦”、“山”、“乙”、“建”等冠位，内中又以大、小、上、中、下细分之。“小山上”相当于“十二阶冠位制”中的“大信”。被封为“小山上”的许率母是大友皇子的“宾客”⁵⁸⁾以精通五经而著称、角福牟则以精通阴阳说而见长，二人能获此较高冠位，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漏刻台”的设立更显示了天智天皇对阴阳学说的重视：

(十年)夏四月丁卯朔辛卯、置漏刻于新台，始打候时，动钟鼓，始用漏刻。此漏刻者，天皇为皇太子时，始亲所制造也。⁵⁹⁾

在政权机构体系中设置“漏刻台”，这恐怕是天智天皇的首创，而将中国的阴阳学说进一步运用于日本国家组织机构的建设，进而形成具有日本精神特质的“阴阳道”，则始于天武天皇(672-686)时期。

如前所述，天武天皇即位前，即已深谙阴阳之术。其对阴阳学说的痴迷程度在日本古代天皇中也是不多见的。在其即位后，更是实施了一系列与阴阳之学有关的政策。首先于天武四年(675)“春正月，始兴占星台”⁶⁰⁾，又于十二年(683)十一月，“诏诸国习阵法”⁶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天武朝时期还增设了阴阳

57)《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377页，岩波书店，1969。

58)《怀风藻》(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第70页，岩波书店，1969。

59)《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377页，岩波书店，1969。

60)《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417页，岩波书店，1969。

61)《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第461页，岩波书店，1969。

寮、外药寮等官制机构，这一点在文献中记载的十分清楚：

天武四年（675）春正月，大学寮诸学生、阴阳寮、外药寮……等，捧药及珍异等物进。⁶²⁾

尽管对于天武天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阴阳寮”以及最初的“阴阳寮”这一国家组织机构的具体职能是什么，我们所知不详。不过，根据成书于701年的《大宝令》的记载，我们仍可以了解其基本构成⁶³⁾。据记载，“阴阳寮”是隶属于太政官八省之一的中务省管辖之下的一级行政建制，职员有近百人之众。其长官称为“头”，掌管天文、历数、风云气色，查天象有异时，可密封奏闻。“头”下设“助”、“允”、“大属”、“小属”四等官各一人。又设“阴阳师”六人，负责占筮、相地；“阴阳博士”一人，教授十名阴阳生；“历博士”一名，指导十名造历和历生；“天文博士”一人，负责观测天文、气色，如有异常，即行密奏，并负责教育十名天文生。另设“漏刻博士”二人，统帅二十名守辰丁计量时刻，鸣钟鼓报时。此外另有“使部”二十人、“直丁”三人⁶⁴⁾。从官员的配置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事务官、技官、技官兼教官等几类，其中“漏刻博士”、“守辰丁”的设置，很显然是直接承继了“漏刻台”的体制⁶⁵⁾。人员如此庞大的机构建制，从事的都是与阴阳之学、阴阳之术相关的事务，不能不说中国的阴阳学说在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构建中，担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为律令国家的一个官僚机构，阴阳寮的成立事实上标志着日本的阴阳道已经开始形成。阴阳寮的官制显然是直接受到唐制影响而形成的，但又明显有所不同，对“阴阳师”表现出特殊的信赖和敬重，这与天武天皇本人就是个阴阳师之类的人物不无关系。如前所述，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之际曾“亲秉式占”，如果不是一个熟谙阴阳之术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在战争之初观测“天文、风云的气色”，以预言战争结果之所为，更颇似一个“查天象有异，密封奏闻”的“阴阳头”的行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设立阴阳寮这一机构的同时，还需要把对阴阳道有独特造诣的僧人们也一并纳入官僚体系，这不仅体现了对阴阳道的重视，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将阴阳学说运用于律令国家的权利统治，换言之，日本的阴阳道已经被赋予了为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服务的特质。

62) 《日本书纪·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 第417页，岩波书店，1969。

63) 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令”的制定，当以“近江令”为其嚆矢，但近江令文本今已失传。在日本律令制度史上，近江令时代又称为飞鸟御原朝廷律令时代，而成书于701年的《大宝令》则是在“飞鸟御原朝廷律令”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因此我们大致可以从《大宝令》中窥见其端倪。

64) 窪美昌保，《大宝令新解》第45页，南阳堂书店，1925。

65) 田村圆澄，《阴阳寮成立以前》(《阴阳道丛书4特论》第35页，名著出版，1991。)

《参考文献》

- 《古事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岩波书店，1969。
《古語拾遺》，安田尚道、秋本吉校注，日本古典文庫，現代思潮社，1976。
《万葉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岩波书店，1969。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一)》，台灣商務印書館刊，1988。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一)》，台灣商務印書館刊，1988。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易類》，台灣商務印書館刊，1988。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台灣商務印書館刊，1988。
《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本居宣長》《玉勝間》(日本思想大系40)，岩波书店，1978。
《宋書》，中華書局，1983。
《隋書》，中華書局，1973。
《延喜式》，吉川弘文館，1977。
《日本書紀·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岩波书店，1969。
《日本書紀·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岩波书店，1969。
《懷風藻》(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岩波书店，1969。
《續日本紀》，現代思潮社，1985。
《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岡田正之，《憲法十七條に就いて》，《東洋文庫論叢第十·近江奈良朝の漢文學》東洋文庫，1929。
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人文書院，1982。
上田正昭，《日本古代の信仰をめぐって——古代信仰における道教思想の影響》，《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1号，大和書房，1977。
窪美昌保，《大宝令新解》，南陽堂書店，1925。
田村圓澄，《陰陽寮成立以前》，《陰陽道叢書4特論》，名著出版，1991。
嚴紹璽，《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津田左右吉，《天皇考》，《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三卷，岩波書店，1964。
村山修一，《日本陰陽道史話》，大阪書籍，1987。
村山修一，《日本陰陽道史總說》，塙書房，1981。
沈才彬，《天皇と中国皇帝》，六興出版，1990。
泷川政次郎，《二條陣屋研究》，《早大比較法研究所紀要21号》，1962。